



“东安市场，作为北京王府井繁华商业区中的一景，早已蜚声中外。而在老北京西城中，尚有一个与它相对应的西安市场，大概就鲜为人知了。”

东安市场今尚在 西安市场何处寻

民国时是民间游乐场所

1947年，我随同母亲从辽宁锦西迁居北京，住入西四北大街小糖房胡同甲四号。这个小院落位于胡同路北的最东端，胡同口上，与我家东南角院墙相接处立有一座不高的灰砖牌楼，上刻“西安市场”四个大字，自右向左，楷书，每个字约尺半见方，端庄凝重；左下方有一行小字——遗憾的是，在那里住了二十年，我始终未曾留意那是书法家的名款，还是建立牌坊的时间。

牌楼后面，即西安市场。市场呈长方形，东西窄，南北长。北端在我家向东的延长线上，南端临马市大街，我估算得差不离的话，其面积约有足球场的三分之一左右。

西安市场历史悠久。据说，明清两代这里以卖鹌鹑闻名京城，而那时宫廷里的太监多以饲养鹌鹑为乐，就像今人养小猫小狗一样。西安市场在皇城根儿西边，距皇宫不远，也就成为众多太监常来常往之地了。到民国期间，这里已经像天桥一样，聚集了不少的民间艺人，各占一块场地，唱大鼓，变魔术，拉洋片，说相声，成了底层市民的游乐场所。那期间，几间茶馆也应运而生。有的请评书演员献艺，有的接待京剧爱好者清唱自娱。据说，其中一间茶馆聚集了不少谜语爱好者，并结成了诗社，定期活动，其成员多为饱学之士，他们设计的谜面均来自烂熟于心的学养，四书五经，诗词歌赋，时调俚曲，民俗掌故，无所不及。想来那是一群智慧不凡的雅士吧！

记忆中的茶馆与电影院

我结识西安市场时，它已失去了往日的风光。



市场西墙下，以及市场正中部位，盖了四排房子，未免堂皇了些，说是棚屋，更为准确。一间紧挨一间，低矮破旧。从屋檐下伸出的长长的棚子几乎遮挡住了全部阳光，每间屋子都黑黢黢的。

在市场正中心的两排棚屋里面，尚有一片空地，有两个篮球场大吗？差不多，那里疏疏落落地排列着十几张厚重的大木案子，每张木案边，都支着一根大木杠子，杠子上套着几个黑黢黢油亮亮的大铁钩子。天麻麻亮时，这些大铁钩子都挂上整扇儿的猪肉，放眼望去，市场上虽无“酒池”，却实实在在是一片“肉林”。西城大小小饭馆里来采购的厨师便在这里闹哄哄地讲价还价。待天大亮时，猪肉批发商们就收摊儿了。这期间，也有不少穿着大褂儿，夹着包袱的银元贩子，吆喝着“买两块，卖两块……”手上一擦银元掂动着，哗唧唧响，很清脆，很动听。

每逢春节期间，肉贩子们歇业，

这里便呈现出一抹零落的节日景象。又有些民间艺人来了，他们把彩绘的兔儿爷、木刀、木枪、花脸儿和亮晶晶的噗噗镗儿，摆在切肉的木案子上，当然也少不了花生、瓜子、橘子糖、关东糖。在木案子的间隙，地上摆着花花绿绿的瓷瓶、泥人、纸烟、兔儿爷，那是套圈儿的。孩子们买十个竹圈儿，一个一个地套。有的大人则满天花雨，十个八个一齐往前扔。抬眼看看，整个市场总共也就四五个摊子吧，远不成气候。

市场东边，还保留着一间茶馆，很宽敞，很干净。每逢夏天，店主便在茶馆前用苇席搭起一座凉棚，并搬出几张茶桌，供客人纳凉。茶馆里总是冷冷清清，落落寞寞，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。想必是时局动荡，很少有人能优哉游哉地坐茶馆了。当时西安市场最大的亮点是建国西堂电影院。它坐落在市场的西北角上，几乎和我家毗邻。它常常设连环场，观众可随时买票进去，没看到前半截儿，没关系，散场之后不必出去，等下一场放映时再补上。如果你愿意，可以坐到半夜，想看几场看几场。影院的经营状况大概也不甚佳，因为它有时停放电影，改演京戏。每逢那时，咚咚锵锵的锣鼓声，便飞进我家院子里，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，建国西堂迁至马市大街路北，那便是今天的胜利电影院。

北京解放后，很长一段时间里，西安市场没有什么变化。好像在“文革”前夕，市场正中央的两排棚屋拆掉了，改建为一座三四层高的简易楼。而市场西边的棚屋和东边的茶馆仍在。那时，我已离开小糖房胡同了。

摘自搜狐网

■史海钩沉



八里长桥不免桅

从北京到杭州有条大运河，运河长有三千多里，单独这从北京到通州区的东西一段，叫作“里运河”，故事就出在里运河。

里运河是从通州城北门往西，直到北京城东便门的一段河道。这段河河身窄，河底浅，比起“外运河”的水势来，那就差得远了。可是，皇帝老儿偏要在这段河上运粮！还偏要叫粮船走过桥底下！外运河上的粮船，都有挺高的紫杉桅杆，走起船来，挂满了篷帆，是很好看的。有这么一座大石桥，有桅杆篷帆的粮船，怎么能走过桥底下呢？可是，皇帝老儿的话，谁敢违抗？这可真把里运河上的船户急坏了——交不了差，大伙儿都是砍头的死罪，大伙儿愁烦得吃不下睡不着。

一天两天过去了，大伙儿琢磨出怎样在里运河上走粮船了：不会把粮船缩得比外河粮船小、少装粮食吗？大伙儿都说：“对，对！粮船虽然小，也是粮船呀！”

第二个难题来了：怎么能叫粮船走过桥底下呢？一天两天过去了，三天四天又过去了，大伙儿琢磨出主意来了：不会在粮船过八里桥的时候，叫上闸墩的闸板少放水，桥底下水低了，桥孔就高了，粮船不就过去了吗？大伙儿说：“对，对！只要粮船过得去桥，咱们就交了差。”

第三个难题太大了：粮船过八里桥都很难，带桅杆的粮船，怎么能过得了八里桥？一天两天过去了，一月两月过去了，大伙儿还是没想出主意。

这一天，天气真热，大伙儿坐在河边上，都觉不出一丝凉快来。船户说：“咱们先吃一顿凉‘饽饽’（饽饽念‘合洛’，是北方一种面食，用白面、高粱面、荞麦面、豆面轧都可以。人多吃饽饽时，可以用轧床子，轧床子与榨果汁的小木床子相似，只是大得多，并且在床子中心有轧槽，槽底有铜漏子）吧。”大伙儿说：“对，先吃一顿凉饽饽，败败心火！”

做饭的是一个爱说爱笑的小伙子，他上了轧床子，一抬轧杆，“噌”的一声，就装满了一轧槽面，一落轧杆，“唰”的一声，就落满了一锅饽饽。这小子轧得高兴了，就唱了起来：

饽饽床子什么人修？

长长的饽饽掉在锅里头。

轧杆立起来又落下，哎——

吃得人人不发愁！

呀呼咳咳，呀呼呀呼咳咳，呀呼……

这个小伙子，还没“呀呼”完，一个造船工匠嚷起来了：“诸位哥们儿，先别吃饽饽，你们听他唱‘轧杆立起又落下’了吗？要是把桅杆做成像轧杆似的，过八里桥的时候落下来，过了八里桥再立起来，扯上篷帆，不就是‘八里长桥不免桅’了吗？”大伙儿都高兴了，连说：“对，对！”

“八里长桥不免桅”这句话，是流传下来了。那爱说故事的人们，总是说完故事，添上一句：那小伙子兴许就是鲁班爷——也许是鲁班爷的儿子、孙子，鲁班爷的徒子、徒孙。

摘自京报网